

建安七子詩箋註

郁賢皓  
張采民  
箋註

巴蜀書社

郁賢皓 張采民 箋註

建安七子詩箋註

巴蜀書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責任編輯：施維  
封面設計：李文金

建安七子詩箋注

巴蜀書社出版

廣州市南河印刷廠製型

德陽報社印刷廠印刷

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九〇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五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伍圓伍角

## 凡例

〔一〕本書以馮惟訥《古詩紀》（四庫全書影印本）作底本，編排次序均依之。唯卷數不依《古詩紀》，七子詩每人爲一卷，共分七卷。凡《古詩紀》所無，據別本補入之詩，則列於每卷最後，並在第一個注釋中說明。凡《古詩紀》以前已著錄該詩的各典籍亦在第一個注釋中說明。

〔二〕凡各本與《古詩紀》不同的重要異文，均於注末出校。《古詩紀》明顯訛誤，則依別本正之，並注明今從某本。

〔三〕《古詩紀》中的原注，一律移至該詩注中，並標明「詩紀云」字樣。

〔四〕詩題悉從《古詩紀》。從別本補入者，則用其本原題；若無題，則用首句爲題，四句以上者，題前標爲「失題」，如僅存一、二句者，題前標「句」。

〔五〕凡作品的真偽、作年、解題等均在該詩的第一個注釋中加以說明。

〔六〕本書一律用新式標點，人名、地名、年號等則不標專名號。

〔七〕凡前人對每篇作品的評論，盡量收羅完備，依評論者時代先後列於該詩注釋之後。

〔八〕有關作者的傳記和著作資料附於各卷之末。

〔九〕輯錄前代典籍中總評七子詩歌的資料列於書後，並依時代先後排列。

〔一〇〕編撰《建安七子年表》，附於書後，供讀者參考。

上卷 曹孟德集 一 失傳

〔一〕曹孟德集 古詩注 黃本亦無人考 用因其不題 恐遺 用因自目 異 則其

〔二〕《古詩集》中四原五 一 曹孟德集 詩中 並謂其 一 卷之三 半 卷

五 五 並五 即全 其本

〔三〕《古詩集》 不同的集題後文 似與五本相 古詩集 曹孟德集 附於原本

一 曹孟德集中 曹

於其 曹孟德 五古詩 一 篇 五篇 中 五篇 其 古詩集 內 曹孟德 著 曹孟德 詩 曹孟德 詩

〔四〕《古詩集》 五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五〕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曹孟德 集 古詩

## 前 言

### (一)

建安時代是中國詩歌史上的一個輝煌時期，它打破了兩漢四百年間文人詩壇的沉寂局面，使詩歌創作進入一個嶄新階段。而建安詩壇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他們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那個戰亂年代的社會生活，體現了慷慨悲歌的「建安風骨」。

「七子」的名稱，最早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他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可見七子在當時已有很大的名聲。七子大都在早年經歷過顛沛流離的生活，後來又先後歸附曹操，所以他們的詩歌創作都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作品多感傷時亂和哀嘆人生的悲涼之音；後期則多抒寫壯志和歌詠遊宴、稱頌恩德之作。七子的詩歌是建安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是歷來對三曹的研究較多，也較深入，而對七子却不甚重視。其實，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對七子的

詩歌作深入的研究，可以加深對「建安風骨」的認識。

## (11)

沈德潛《古詩源》卷五云：「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亦云：「細揣格調，孟德全是漢音，丕、植便多魏響。」所謂「漢音」與「魏響」，是指建安詩歌的兩個不同的階段。「漢音」，慷慨悲歌，質樸渾厚；「魏響」，以情動人，華美壯大。這正是「建安風骨」的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從總體上看，七子的詩歌既不象曹操那樣「全是漢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樣「純乎魏響」，而是由「漢音」向「魏響」過渡的橋梁，更全面地體現了「建安風骨」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由反映動亂的社會現實到抒寫個人內心性情，是由「漢音」向「魏響」轉變的重要一環。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說建安詩人是「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所謂「慷慨」，即激蕩着悲涼憂傷的感情；所謂「任氣」，即指文氣盛暢，風骨遒勁。反映現實，慷慨悲涼，是「漢音」的重要特徵。七子作為敢於正視現實的有識之士，繼承和發揚了這一傳統，他們的詩作內容充實，強烈地回響着「漢音」階段所富有的現實主義精神，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詩》其一描繪的就是一幅難民流亡圖：「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這是對漢末動亂現實的高度概括，

而饑婦棄子的場面則是作者在衆多的難民生活場景中精心截取的一個特寫鏡頭，「亂世之苦，言之真切」（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使讀者對人民的苦難有了具體而真實的感受，震撼着人們的心靈。而《從軍詩》其五則是具體描繪戰亂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人煙稀少，雜草叢生，家國殘破，這正是動亂社會的真實寫照。阮瑀的《怨詩》對現實社會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落恒苦辛。」在詩人看來，現實社會就是一條吞噬人們生命的罪惡之河，而處於社會最底層的人民，不過是河中的一粒塵土，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凶禍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無法掙脫。這首詩傾吐了當時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千千萬萬人民的怨聲。另外，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寫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寫孤兒的悲慘遭遇，應瑒的《別詩》寫流落他方的思鄉之愁等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無不激蕩着慷慨悲涼之氣。可以說七子的這些動人心弦的歌唱是當時社會現實的產物，是時代的音響。

七子有不少反映現實的作品，但更多的作品却是表現個人的內心情性。這些作品大多抒情氣氛濃郁，感情真摯動人。它既非歌功頌德，亦非諷諭勸戒，而是大膽抒寫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應該說，以情動人的藝術特點，集中體現了「魏響」新風的內在特質。前人的評論就注意到這一點：陳祚明說王粲《七哀詩》「以情至爲工」，應瑒《別詩》「自然入情」，劉楨《贈五官



中郎將》「情自宛切」（《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沈德潛說徐幹《室思》「情極深致」（《古詩源》卷六）。這些評語，都很有見地。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七子生活在戰亂頻仍的年代，背井離鄉，親人四散，因而抒寫離情別緒，便成爲七子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王粲《從軍詩》其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這種難以抑制的憂思，正是七子在當時的共同感受。再如徐幹《室思》：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阮瑀《七哀詩》：「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應瑒《別詩》：

「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傷，哀婉動人。這種傷感的情緒儘管使人哀痛不已，

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頹喪，却常常在悲嘆中鬱積着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這在七子的詩歌中有突出的表現：「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王粲《從軍詩》其四）；「於心有不厭，奮翅

凌紫氛」（劉楨《贈從弟》其三）；「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孔融《雜詩》其一）；「庶

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陳琳《遊覽》其二）；「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等等，都洋溢着乘時建功立業的豪邁情懷。當然有時也有對坎坷經歷的悲嘆，

對時光流逝、壯志難酬的感慨。但是不論是對理想的追求，還是失意時的惆悵，都是作者真實感情的流露。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動亂的現實在詩人心靈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

到由此而產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注重抒情，並始終貫穿着昂揚奮發的基調，可

以說是「魏響」新風的基本特徵。七子詩歌從反映社會現實到抒寫拯世建功的情懷，正體現了「漢音」到「魏響」的過渡。

由質樸渾厚走向華美流麗，是由「漢音」向「魏響」轉變的重要標誌。

從總體上說，七子的詩歌還是比較質樸的，尤其是他們創作的那些樂府詩，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點。但他們已開始追求語言的工麗、形式的華美，逐步走上華麗壯大的道路。魯迅先生曾說七子的詩歌「不外是『慷慨』、『華麗』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確實抓住了七子詩歌的這一新特點。

前人說漢魏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這種說法並不準確。其實七子已注意到錘煉字句對提高詩歌語言表現力的重要作用。陳祚明曾說公幹詩「筆氣雋逸，善於琢句」，偉長詩「造語匠意」，元瑜詩「間有奇語」（《采菽堂古詩選》卷七）。吳淇也說仲宣「風流雲散，一別如雨」（《贈蔡子篤詩》）二句「煉得精峭」（《六朝選詩定論》卷六）。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等千古傳誦的名句，無一不是精心錘煉而成的。這些句子不僅內涵豐富，而且具有很強的美感，含蓄蘊藉，餘味無窮。就是選詞用字，也頗見錘煉之功。「百卉挺葳蕤」的「挺」字，「菡萏溢金塘」的「溢」字，不僅寫出了花卉的繁茂，而且還給人一種動態的美。而徐幹善用虛字，則更是備受後人稱贊：「句中多用虛字作健，非魏人不能。以能役虛字作轉語，每句動折故健也。」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特別是《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句，後人激賞，摹擬不已。當然，七子的煉字煉句，還不似曹植的刻意雕琢，較少斧鑿痕跡，仍不失自然的本色。

七子有不少意境醇厚，形式華美的佳作，這與他們善於吸取前人的營養，繼承和發展各種藝術技巧是分不開的。劉楨《贈從弟》全篇用比，意蘊深厚。詩人「真骨凌霄，高風跨俗」（鍾嶸《詩品》）的品格，正是通過蘋藻、青松、鳳凰所具有的象徵意義，纔呈現在讀者面前。融情於景，借景抒情，更是七子常用的藝術手法。王粲《從軍詩》其三描繪了征吳途中見到的淒涼秋景。作者把夕陽的餘輝、蟋蟀的哀鳴、孤鳥的翻飛、草露的寒涼等富有特徵性的景物有機地連接在一起，構成一幅濃烈的「悲秋」圖，有力地烘托出征夫淒涼、孤獨、悲愁、思親的情懷。情與景渾融一體，創造了一個典型的藝術氛圍，從而反襯出作者要求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七子很善於從民歌中吸取養料，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在繼承漢樂府的同時，又有創新，就是突出的例子。詩人用整齊的五言，和諧的韻律抒發自己的感情，並用第一人稱的對話形式，把自己與孤兒的感情交織在一起。這樣讓人物站出來自己傾吐苦難，聲淚俱下，更能打動人心。這不能不說是對漢樂府《孤兒行》的發展。同時，七子還十分重視形式的整齊劃一，音節的和諧流暢。如王粲《雜詩四首》其一：「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馳厲中原。北臨清漳水，西看柏楊山。回翔遊廣園，逍遙波水間。」全詩八句，隔句用韻，對仗工整，暗合音律，已接近五言律詩的形式，也可以說是後代新體詩的雛型。

這些都說明七子詩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華美工麗的特點。正如許學夷所說：「漢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幹、仲宣始見作用之跡。」（《詩源辨體》卷四）注重語言的錘煉，形式的華美，可以說是「魏響」新風的鮮明特色。七子詩歌從質樸渾厚到華美壯大，也正體現了「漢音」到「魏響」的過渡。

在「漢音」向「魏響」過渡的軌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正是「建安風骨」在前後兩個階段的不同的表現形式。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係，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七子的詩歌則是聯結二者的紐帶。

### (111)

七子的詩歌不僅具備建安文學的共同特色，而且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個性風格。正如沈德潛所說：「鄴下諸子，各自成家。」（《古詩源》卷六）鮮明的個性風格，可以說是「建安風骨」的重要特徵之一。

在七子中，王粲、劉楨成就較高，歷來「曹王」、「曹劉」並稱。劉熙載《藝概·詩概》云：「公幹氣勝，仲宣情勝。」非常準確地抓住了兩人的特點。王粲是一位天資聰穎，才華橫溢的作家。《三國志》本傳說他「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

思，亦不能加也」，所以蔡邕稱他有「異才」。他的作品充滿才情，結構嚴謹精巧，語言凝煉，詞藻華美，感情真摯，真是「文若春華，思若泉涌」（曹植《王仲宣誄》）。無論是言情，還是述志，都能揮灑自如，酣暢淋漓。爲後人稱賞的《七哀詩》其一就有這樣的特點。特別是在結構與選材上更具匠心。前人認爲王粲詩意象不够雄渾，「體弱」、「質羸」，這種看法似欠公允。即以此詩而言，不僅意境闊大，而且氣韻沈雄，極似魏武風韻。方東樹就曾說，此詩「莽蒼同武帝，而精融過之，其才氣噴薄，似猶勝子建」（《昭昧詹言》卷三），確是過人之見。王粲胸懷大志，却又性格浮躁（一）。因而慷慨中常常流露出要求建功立業的急切心情，感情激蕩，鋒芒突出。故劉勰說：「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文心雕龍·體性》）這一點在《從軍詩》中表現得尤爲明顯。他博聞彊志，學識深廣，善於用典，常常化用前人成句而不露痕跡，如《贈文叔良》、《思親詩》等篇就是如此。王粲的不足之處是有些應酬之作格調不高，頌諛過甚。但就總體而言，他不愧爲建安詩人中的佼佼者。前人所謂「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鍾嶸《詩品》）；「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皆不失爲中肯的評價。

劉楨才情自不及王粲，但他的詩風骨遒勁，意境峭拔，則又在王粲之上。剛正氣盛可說是劉楨詩歌的鮮明特色。《贈從弟》中表現出的那種高潔、堅貞、傲岸的品格自不必說，就是一些應酬之作，也不乏清正之氣。《公讌詩》沒有絲毫酒肉氣，倒象一首清新秀美的寫景詩。《贈五官

中郎將》只寫對好友的深厚情意及內心苦悶，毫無阿附權貴的卑乞之氣。而《贈徐幹》則更是感情憤激，充滿慷慨不平之氣。作品中的所謂「氣」，實質上是詩人品格與氣質的外化。劉楨詩「氣盛」的特點，正見出其品格、個性的高潔、耿介。據史載，他曾因平視曹丕夫人甄氏而獲罪被刑〔二〕，又曾直諫曹植以禮待家丞邢顛〔三〕。這種個性、品格，體現在作品中便是一種剛正之氣，陽剛之美。鍾嶸《詩品》說他的詩「雕潤恨少」，其實這算不上大缺點。劉楨詩最大的不足是反映現實的面比較狹窄，所寫多是友情與個人遭際，缺少象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詩》那樣史詩式的作品。但總的來說，他還是建安詩人中成就較高的一個。他的詩「比漢多姿，多姿故近；比晉有氣，有氣故高」（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陳思以下，楨稱獨步」（鍾嶸《詩品》）。與王粲相比，各有所長，堪稱伯仲。

陳琳、阮瑀、徐幹，皆以文章稱譽於當時。與王粲、劉楨相比，他們的詩歌則較質樸厚重，尚多「漢音」，故許學夷說三人在七子中最少「作用之功」（《詩源辨體》卷四）。這與他們都熱衷於向民歌學習有密切關係。但由於各自的經歷、性情、愛好不同，所以他們的作品也各有自己的個性風格。陳琳青年時代即被稱為「州里才士」（《三國志·魏志·張昭傳》），是個有才華、有抱負的人。可惜早年擇主不善，曾委身於曹操的主要對手之一——袁紹，並且冒犯過曹氏〔四〕。歸曹後，只是由於曹操愛他的文才，纔沒有加罪於他，但不免對他有疑忌之心。他常常懷有「羈客難爲心」（《遊覽》其二）這樣寄人籬下的感慨，壯志難伸的苦悶一直鬱積於心間，

所以他的作品較多慷慨之音。「慷慨」雖是時代的特色，但陳琳往往在慷慨中隱含着一股功名未就的憂憤之情。《遊覽》其二：「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還寢房，慷慨咏墳經。」懷才不遇，而又行將暮年，這種強烈的憂苦之情，無時無刻不在咬噬着詩人的心靈。「軾軻固宜然，卑陋何所羞？」（失題〔春天潤九野〕）長歌之哀，甚於慟哭，看似寂達之言，實際上更突出了詩人內心的痛苦。這種深沉的慨嘆，仍不失為一個志士所發出的時代之音。在七子中，阮瑀最善於周旋於曹氏兄弟之間，且與曹丕交往頗深。但曹氏父子只把他看作一個文學侍從和摯友而已，政治上並不得意，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一股悲音」。《雜詩》其一：「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為感，感此用哀傷。」「悲風」，在建安詩歌中屢見不鮮，它是當時社會及文人心態的反映。詩人臨川而嘆，感到整個世界都浸在一種可悲的氛圍之中。「丁年不再遇，富貴不重來」（《七哀詩》），令人生悲；「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傷」（《苦雨》），令人生悲；「白髮隨櫛墮，未寒思厚衣」（失題〔白髮隨櫛墮〕），令人生悲……「多悲風」，正是詩人面對一個混亂而又淒慘的世界發出的感慨。它形成了一個特有的意象，不僅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特色，也反映了詩人的心境，體現了他的詩歌的風格。徐幹一生潛心學問，對功名利祿極為淡薄，始終清正自守，適志而行〔五〕。徐幹詩較少建功立業的熱望，多寫思親離別之情。故而感情真摯細膩，文辭也較為自然流麗。《室思》乃千古絕唱，但却得之於自然，文辭華美，情極深致，「宛篤有《十九首》風骨」（鍾惺、譚元春《古詩歸》卷七）。

應瑒早年曾飄泊他鄉，歷盡艱辛，故而他的作品傷感情緒較濃重，正如謝靈運所說：「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嘆。」（《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構思巧妙，以雁自喻，悲嘆身世。作品將比喻、擬人、對話等融為一體，取得了特殊的藝術效果。故陳祚明說此詩「吞吐低徊，宛轉深至，意將宣而復頓，情欲盡而終含，務使聽者會其無已之衷，達於不言之表。」（《采菽堂古詩選》卷七）應瑒是比較重視藻飾的，他的作品辭采斐然，最接近曹植「詞采華茂」的風格，可惜流傳下來的作品太少。

在七子中，唯有孔融與曹氏兄弟及諸子交往最少，且以書表著稱。他比曹操年長二歲，嚴格地說應屬漢代作家。他首創「離合體」，也嘗試寫作六言詩，只是成就不高。《雜詩》算是寫得較好的，但作者歸屬尚有爭論。孔融性格豪放，不拘禮節，然而志大才疏，最爲曹氏所忌。他的詩雖含蓄蘊藉不足，然風格豪宕，也有鮮明的個性特色。

簡言之，王粲才情橫溢，辭藻華美；劉楨剛正道勁，高風跨俗；陳琳雄健氣盛，磊落不平；阮瑀悲慨多氣，平易質樸；徐幹清新流麗，平和自然；應瑒辭采斐然，宛轉深至；孔融文氣豪宕，剛健質直。七子的詩歌個性鮮明，各具特色，這正體現了「建安風骨」內涵的豐富性，也可以說是建安詩歌之所以能取得較高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



## (四)

七子詩歌能取得這樣高的成就，與三曹一起創「建安」一代詩風，除了社會動亂的影響及作者個人等因素外，建安時代文學價值觀念的轉變和文學意識的增強，以及漢末清議風尚的盛行，構成了「建安風骨」產生的特定的社會環境。

由於曹氏父子的倡導，建安時代形成了較為集中的文學團體。鍾嶸《詩品》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在曹氏父子周圍形成這樣一個龐大的文人集團，對建安文學的發展起着重大的促進作用。從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及《與吳質書》中所描繪的與七子交遊的情景，就可以看到當時文人聚會的盛況：「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與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與吳質書》）七子詩中也有類似的描寫：「明月照綈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其四）；「巍巍主人德，佳會被四方。開館延羣士，置酒于斯堂。辨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應瑒《公讌》）；或互相唱和、贈答，或主人命題、賓客同作，是建安詩壇的普遍現象。《初學記》卷一〇引《魏文帝集》云：「爲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